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

(一九四九·十·一——一九八九·十·一)

主 编 石志夫
副主编 徐昕
子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

(一九四九·十·一——一九八九·十一·)

主编 石志夫

副主编 徐昕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石志
夫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6**

ISBN 7-301-02302-2

I . 中…

II . 石…

III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史-1948—1989.10

IV . D829

出版者地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 政 编 码：100871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2.5印张 320千字

1994年6月第一版 1996年6月第二次印刷

定价：14.00 元（**内部发行**）

前　　言

经过几年的研究生、大学本科生和大专生的教学，深感需要一部适合于上述各文化层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教科书。于是，凭着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我们编写了这本对外关系史，权当教材之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它是文科一些专业的研究生、大学本科生，甚至大专生必修的一门课程。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门学科的学习更加显得重要。在这个学科领域中，需要学习和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国家与国家的官方关系、政党关系以及民间关系。近年已有一些学术著作问世，给予我们以很好的启示。我们在编写本书时，注意抓住以下几点：

第一，本书内容涉及的时间，仅限于 1949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0 月，共 40 年；

第二，本书以史为主线，同一些专题、事件叙述相结合进行撰写；

第三，本书以叙述为主，夹以一定程度的分析和评议；

第四，本书是一部政策性较强的著作，因此撰写时注意政策的严肃性和史实叙述分析的严谨性；

第五，本书撰写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和处理。

这本教科书由石志夫任主编，徐昕任副主编，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本书的整体构架是按主编多年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 6 / 3 M 1 / 27 / 23

史》的体系设计的。本书各章由主编、副主编分头组稿，由主编统稿、定稿。本书写作分工为：石志夫写第一、二、三、四、十八章、第六章第二节、第十九章第一节，徐昕写第十章，张植荣写第五、十一章，丁斗写第十三、十四章，张良福写第七、十七、二十一章，胡若卿写第十六、二十章，孟博写第八章，陈之罡写第九章，李扬帆写第十二章，韩朝东写第十五章，张鸿雁写第六章第一节，李岩松写第六章第三节，刘敬师写第十九章第二节，刘宏、刘敬师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大事概览》。

本书作者中一些人是外交部离休干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杨公素教学中的同事；另一些人是杨公素和石志夫指导过的研究生，在教学、科研都曾得到过杨老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本书在酝酿编写中，得到赵宝煦教授、梁守德教授以及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领导同志们的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手中掌握的档案材料有限，加之时间匆促，书中错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读者批评指正。

石志夫

1992.12.30.

目 录

第一章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奠立.....	(1)
第一节 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制订对外方针政策	(2)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11)
第三节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	(19)
第二章 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中国与社会主义 国家的关系.....	(30)
第一节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	(30)
第二节 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	(37)
第三节 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44)
第三章 抗美援朝决策及抗美援朝期间的外交斗争.....	(49)
第一节 抗美援朝的决策	(50)
第二节 朝鲜战争升级的制止和抗美援朝初期的 外交斗争	(60)
第三节 朝鲜停战谈判	(65)
第四章 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和中美大使级会谈.....	(70)
第一节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70)
第二节 中美大使级会谈	(81)
第三节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86)
第五章 打破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封锁和建国初期的 对外经济关系.....	(94)
第一节 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贸易禁运”的 破产	(94)
第二节 建国初期对外经贸关系的建立	(98)
第六章 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104)
第一节 参加日内瓦会议	(104)
第二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广泛应用	(114)
第三节 亚非会议及“万隆精神”	(126)
第七章 中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原则和睦邻友好	
关系的建立	(132)
第一节 关于同邻国边界问题解决的原则和睦邻友好	
关系的建立	(132)
第二节 中印两国关系的恶化和边界争端	(140)
第三节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148)
第八章 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154)
第一节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154)
第二节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	(159)
第三节 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167)
第九章 积极推进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	(174)
第一节 支持亚非拉国家和民族为争取与维护民族	
独立的斗争	(174)
第二节 第二次建交高潮	(181)
第三节 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 13 国	(185)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对外关系	(190)
第一节 国内动乱波及外交工作	(190)
第二节 对外关系陷于中断	(192)
第十一章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和发展	(195)
第一节 反对对日单独媾和与“日蒋和约”	(195)
第二节 中日两国人民为邦交正常化而斗争	(199)
第三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206)
第十二章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发展	(212)
第一节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	(213)
第二节 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221)

第三节	反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和“八·一七”公报的发表	(226)
第十三章	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	(233)
第一节	缓慢发展时期	(234)
第二节	全面发展时期	(238)
第三节	持续发展时期	(243)
第十四章	进一步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247)
第一节	70年代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247)
第二节	80年代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251)
第十五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	(258)
第一节	中苏关系的初步改善	(258)
第二节	“三大障碍”的排除	(263)
第三节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270)
第十六章	中国同朝鲜、东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	(274)
第一节	中朝友好关系的发展	(274)
第二节	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277)
第三节	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281)
第十七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曲折发展	(285)
第一节	60—70年代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影响	(285)
第二节	排除“左”的干扰,引进技术和设备	(292)
第三节	70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	(295)
第十八章	中国对外政策的全面调整	(302)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全面调整的社会历史背景	(302)
第二节	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306)
第三节	调整后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作用和特点	(313)
第十九章	港、澳问题的和平解决与“一国两制”	(319)
第一节	关于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	(319)

第二节	关于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	(323)
第二十章	在国际机构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328)
第一节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28)
第二节	中国的裁军立场和主张	(336)
第三节	中国为维护和平和正义,推动国际经济文化合作 而奋斗	(341)
第二十一章	中国领事工作概述	(346)
第一节	中国同外国互设领事馆和签订领事条约的情况	(346)
第二节	解决外国在华遗留的资产要求问题	(352)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大事概览	(359)

第一章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奠立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国家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①。“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③。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为其自身利益和同盟者的利益，必须利用国家机器制订政策为其服务。而每个国家都有对内政策、对外政策，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服从于它的对内政策，或者说是对内政策的延续。一个国家对外战略方针的决定，对外政策的制订，必须服从于它的立国原则。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对外方针政策指导下开展的对外关系，必须以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转移，必须为这个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服务，必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获得全面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被推翻，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就要在全国诞生之际，中国革命的领袖们——即将成为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开始谋划新中国的立国大计，提出了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页。（此处及以下各处所引《列宁全集》均为中文第2版，不一一注出。）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22页。

包括对外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都被纳入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之中，为开国后的大业指明了方向。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接着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特有方式开始了第一次建交高潮，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确保中国的主权独立与完整，奠定了新型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制订 对外方针政策

一、新的对外基本方针的制订

1. 关于“另起炉灶”

1949 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要奉行的对外方针时说：我们的一个重要方针是“另起炉灶”。这条方针的涵义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①，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②；对于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4 页。（此处及以下各处所引《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均为第 2 版，不一一注出。）

^② 同上书，第 1461 页。

2. 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1月末2月初，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①。这一方针的涵义在于，必须先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

3. 关于“一边倒”

“一边倒”方针是毛泽东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毛泽东主席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②这就明确地表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和对外基本方针。

二、三项对外基本方针提出的 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三项对外基本方针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必要决策和慎重选择，是以一定历史、理论为基

① 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1473页。

础，以现实利益为依据而提出来的。

首先，当三大战役结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但是，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存在，中国大陆一些边远地区、岛屿还待解放。美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在大陆还严重存在。在这时，如果不割断外国同国民党的残余力量的公开的、潜在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以至文化思想方面的联系，要想建立并巩固人民政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主席起草的 1949 年 4 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强调，各外国要想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①。对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问题，毛泽东主席坚持：宁愿等一等，因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②。毛泽东主席主张：让我们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不给他们留下活动的余地。因为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虽然被赶走了，但他们在我国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而帝国主义又总想在中国保留一些特权，总想很快钻进来。所以，过早地把它们请进来，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在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先有步骤地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③。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在阶级社会中，外交机构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61 页。

② 同上书，第 1435 页。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0 页。

家机器时，必须连同它的外交机构一起打碎，重新建立包括外交机构在内的无产阶级新的国家机器。1949年11月，新中国的外交部成立。关于外交部的人员构成，周恩来总理强调：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新中国的外交干部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员组成：一、建国以前就从事外事工作的原中央外事组的干部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干部；二、从全国各大军区、各大行政区调来的领导骨干；三、从文科大学选来的毕业生。另外，还有少量起义的旧外交人员担任专家或顾问。周总理为选拔和培养外交干部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①。

其次，“一边倒”方针的提出也是有其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第一，“一边倒”方针是以一定历史、理论为基础提出来的。

毛泽东主席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②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早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③的正确命题。到本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

①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3—3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①毛泽东还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他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②当时，毛泽东以兴奋的心情指出，“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③。这就预示着，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或后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雅尔塔体系逐渐为美苏对峙的体系取代之初，毛泽东提出并论证了“中间地带理论”，在1947年末，毛泽东发展了“两大阵营”的思想，把中国人民的反对美蒋的斗争看成是苏联领导的反帝斗争的重要方面，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④从1947年开始，中共就批评企图在美苏间保持中立的第三势力。1949年6月4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公开指出：在两个阵营中间，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鬼话。这样，到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用“一边倒”的形象语言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必须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的政治立场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倾向。

第二，“一边倒”的决策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一边倒”的决策是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只能作出的一种选择。

首先，就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② 同上书，第651—652页。

③ 同上书，第671页。

④ 参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3页。

初期，中共曾奉行寻求同美国合作的政策，但美国政府却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关上了美国与中共发展关系的大门，没有给中共留下选择的余地。1945年4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即将离开中国的美国驻重庆国民党政府使馆官员谢伟思时说：“外国人一般都不了解，国共问题远不是两个普通政党间的吵吵闹闹。这一问题是原则性的，它与中国的未来生死攸关。”^①还说，战后的新中国是美国贸易和投资的巨大市场。毛泽东是从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和战后形势出发来谈这个问题的。这至少表明中共希望美国在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持慎重态度，也表明中共希望战后与美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甚至一度采取了力争中立美国的策略。可是，美国却坚持其扶蒋反共的政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政府以为其对华政策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完全摆脱；（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扩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以妥协，以避免内战。^②结果美国走上了扶蒋反共的道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共对美国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反美仇美情绪更强烈。当1949年初，三大战役全面结束，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仍不识时务，他在接见国会议员时提出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即只要国民党政权不垮台，就不改变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这等于又一次关死了美国可能通向中共的大门。与此同时，美国鉴于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采取加紧扶植日本以取代国民党中国在亚洲的地位的战略部署，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视为苏联的附庸，在政治上加以反对，在经济上加以封锁。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也为中国的

① 谢伟思：《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380页。

② 参见《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载《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8页。1951年美参院听证会检讨战后对华政策时，谢伟思说：在艾奇逊的三种选择之外，“还有我所建议的第四种选择，即与国共双方都合作，采取一种弹性政策”。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这就更加促使中共积极寻求与苏联结盟。这样不仅可以确保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而且还能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必要的经济技术援助。

其次，就苏联与中共关系而论。苏联在本世纪 40 年代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促使中共更加坚决地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尽管苏共、斯大林同中共的关系有时不很愉快，苏共对中共的支持也并非一贯积极，但是，中共仍视苏共为兄弟党，斯大林为国际共运的领袖，即使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张时期，毛泽东仍然经常写信给斯大林互通情况，两党间保持经常联系。特别是在中国三大战役取得胜利之际，苏联没有像美国那样奉行“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斯大林立即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同中共领导人商谈新中国政权成立的问题，并商定待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事实面前，向中国同志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曾经犯有错误。斯大林这样做，不但得到了中国同志的谅解，而且更加受到中国同志的尊敬。此外，苏联不仅在亚洲是抵抗美日的中坚力量，可以成为中国可靠的战略后方，而且为新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模式。

总之，三项对外基本方针的提出，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决定的，它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大背景下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

三、《共同纲领》关于新中国对外 方针政策的规定

为了成立新中国，1949 年 6 月 15 日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年 9 月 17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宣告了中国人民